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



冯友兰自选集

冯友兰◎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FENGYOULAN ZIXUANJI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

FENGYOULAN ZIXUANJI

冯友兰自选集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JINIANJI

冯友兰◎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友兰自选集/冯友兰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1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81119-421-0

I. 冯… II. 冯… III. 哲学—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6335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FENG YOU LAN ZIXUANJI

冯友兰自选集

冯友兰 著

项目统筹: 杨小兵 责任编辑: 陈 曦
责任设计: 王征发 封面绘画: 王征发
责任校对: 王亚利 责任印制: 沈 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cnuph. com. cn
E-mail master @ cnuph. com. 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33.5 插 页 1
字 数 397 千
定 价 7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出版说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它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10种，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委会

2008年11月

第1版自序

我的学术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我是以哲学为主，以中国哲学史为辅。这个集子所选的作品也是以哲学为限。

我在哲学方面的基本著作是在四十年代所写的那六本书，称为“贞元六书”。这六本书已收入《三松堂全集》第四、五卷中，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

对于这六本书的写作经过，我在《三松堂自序》中已经作了一个概括的评述（见《自序》第二部分《四十年代》），这部集子也收了这个评述。

这个集子的头两篇是《哥伦比亚答词》和《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按其写作年代说，这两篇应该列在最后。之所以列在最前面，是因为在这两篇中，可以看出我一生中学术活动的经过及其方向，特别是第二篇的最后一句：“阐旧邦以辅新命”尤为概括。我又把这一句话作为一副对联的上联，下联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说的是我的学术活动的方向，下联说的是我所希望达到的精神境界。我还打算把这副对联亲自写出来，悬于壁上，以为我的座右铭。

冯友兰

1987年10月19日

自 传

我名友兰，字芝生，汉族。我的原籍是河南省唐河县。祖上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唐河做一些小生意，后来就在唐河祁仪镇落户，成为地主。我的父亲于1898年中了清朝戊戌科的进士，后来在湖北做过知县。

我于1895年12月4日(公历)生于祁仪镇。幼年在家里的私塾里读书。1910年到开封入了中州公学的中学班。1912年到上海入了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1915年毕业。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文科中国哲学门。从此，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就成了我的专业。

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是逻辑学。当时懂得逻辑的人很少。教师教我们读耶芳斯作的《逻辑学纲要》。这本书的内容他也没有全懂，只把它当成一本英文读本，教我们念英文。我就是自己摸索，并且照着书后面所附的练习题，自己练习。这当然不能使我完全懂得书的内容，但是我对于逻辑发生了深厚的兴趣，由此进一步发生了对于哲学的兴趣。

逻辑学引起了对于哲学的兴趣，这个兴趣当然引导我喜欢西方哲学。当我在1915年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上已经开

的只有中国哲学门。据说1915年就要开西洋哲学门。当时我很高兴。可是入学以后，才知道西洋哲学门又开不成了。因为原来打算聘请的那位教授死了。在图书馆里有一书架英文书和德文书，据说是那位教授的遗物。就是这一架外文书，其中有一大部分还是关于宗教的。我没有办法，只得进了中国哲学门。

但是三年的学习，对于我以后的工作，还是很有用处的。这三年的学习使我知道，于三家村中所教的那些专为应付科举考试的东西之外，即专就中国方面说，也还有真正的学问。况且时在“五四”运动的前夕，在当时，北大的情况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这种“风”所给我的感染也是很大的。总的说，这三年中，我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增加了知识，练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些基本功。

我于1918年就毕业了。毕业后，在开封一个中等学校教书。在开封我同朋友们也办了一个刊物，名《心声》，宣传新文化。我也是“五四”时代的人，可是没有参加1919年“五四”那一天的运动，也没有看见那一天的盛况。一直到七八月间，我来北京参加当时教育部的留学考试，才看见了一些那一天的遗迹，听说了一些故事。

留学考试通过了，但因船期耽搁，12月才到纽约，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作研究生。这才有系统地学习西洋哲学。三年毕业，我作了一篇博士论文，这是三年学习的成绩。

这篇论文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用英文原文发表，题名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后来我用中文写出来，作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生哲学》教科书，于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就是《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的中文本，只有最后两章是附加上去的。这两章是我于1923年写的一篇讲演稿。商务印书馆先已列入他们出版的《小百科全书》，题名为《一个新人生观》。《人生哲学》是我在二十年代的主要著作。

我回国以后，本来想继续研究西方哲学史，作一些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的工作，当时的燕京大学叫我担任中国哲学史这门课，讲中国哲学。我在燕京讲，又在清华讲，多年积累，最后完成了我的那一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于1933年出齐。以后有朋友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这是我在三十年代所作的重要著作。

我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总共写了六部书：《新理学》（1939），《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4），《新知言》（1946）。

这六部书，实际上只是一部书，分为六个章节。这一部书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凡是反思，总是在生活中遇见了什么困难，受到了什么阻碍，感到了什么痛苦，才会有。如同一条河，在平坦的地上，它只会慢慢地流下去。总是碰到了崖石或者暗礁，它才会激起浪花。或者遇到了狂风，它才能涌起波涛。当时的狂风，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新理学》这部书是我在当时的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如果把六部书作为一部书看，《新理学》这部书应该题为第一章《总纲》。所以“新理学”这个名字，在我用起来，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南岳、蒙自所写的，商务印书馆1939年所出的那部书；另外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四十年代所有的那个哲学思想体系。以下用不同的符号来表明这个区别。以《新理学》表明前者，以“新理学”表明后者。

当时写这六部书，并不是预先有个计划。只是遇到些问题或遇到有些地方组稿而随时写的。可是毕竟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又好像是有一预定的计划，预写的大纲。那是因为写这些东西时，有一个总的目的，总的动力，那就是抗战。我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序文说：“此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

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续之交，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时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魂兮归来哀江南’；此书能为巫阳之下招欤？是所望也。”这里所说的“重思”，就是上面所说的反思。

《新原人》的《自序》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序文》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昔尝以《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为《贞元三书》。近觉所欲言者甚多，不能以三书自限，亦不能以四书自限。世变方亟，所见日新，当随时尽所欲言，俟国家大业告成，然后汇此一时所作，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的。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日本投降了。在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返的时候，在西南联大的校址，立了一个纪念碑，碑文是我作的。碑文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接着说：“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

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径晓嶮。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校歌中的信念，在铭辞中成为实事。这就是“贞下起元”。

日本投降后，原来翻译我的《中国哲学史》的那位美国朋友，写信来说：他现在美国费城本薛文尼大学当教授。那个大学邀请我去当一年客座教授，一方面给学生讲中国哲学史，一方面同他合作，完成他的翻译工作。1946年暑假，我随同清华回到北京，完成了七年的心愿，随即从北京到费城。因为给学生上课，我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我于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还有南斯拉夫的译本。1985年又出版了涂又光翻译的中文本。差不多同时，我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共产党就要解放全中国。有些朋友劝我在美国长期居留下去。我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下来，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我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到12月清华就先北京城而解放了。在清华解放的前夕，南京派人来，邀赴南京，我坚决拒绝。自此以后，我在人事上虽时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

解放以后，我逐渐认识到，这一代“南渡”的人之所以能活着回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成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革命和建设的热潮空前高涨，各方面的进步，一日千里。

这种情况更加强了我在联大纪念碑碑文中所说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信念。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能做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的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搞了几年，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受了极大的摧残。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又被别有用心地重视起来，来了一个假繁荣。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哲学史中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这也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摧残。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和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应该所写的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在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

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

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着重讲了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作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中国哲学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也有所阐述的历史著作。

《新事论》的最后一篇题为《赞中华》。其最后一段说：“真正的中国人已造成过去的伟大的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之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的。”当时我没有怀疑，现在没有怀疑，将来也是不会有怀疑的。

曾得学位：

北京大学毕业 1918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1924

美国普林西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47

印度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5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1982

曾任职务：

中州大学哲学教授、文学院院长 1923—1925

广东大学哲学教授 1925

燕京大学哲学教授 1926—1928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主任 1928—1952

清华大学秘书长 1928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曾兼校务会议代主席) 1928—1952

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39—1946

美国本薛文尼大学客座教授 1946—1947

美国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1947

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代主席 1948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1949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52 至今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

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六、第七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

目 录



1	第 1 版自序
1	自 传
1	文 选
3	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答词
10	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
12	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
23	宋明道学通论
29	新理学(节选)
31	《新理学》绪论
47	理 太极
72	气 两仪 四象



95	道 天道
113	道德 人道
133	义 理
149	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节选)
151	别共殊
162	明层次
174	辨城乡
186	说家国
199	新原人(节选)
201	《新原人》自序
203	觉解



219	境界
235	天地
259	新原道(一种中国哲学之精神)(节选)
261	《新原道》绪论
269	孔孟
284	老庄
300	禅宗
311	道学
328	新统
343	新知言(节选)
345	《新知言》绪论